

在知识创新与教育转型的浪潮中,新文科建设成为文科突破学科壁垒、回应时代挑战的关键路径。本版邀请专家从不同维度展开阐释,既剖析了文科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与进路,又指明了其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服务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价值,旨在为推动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提供思路借鉴,助力文科在跨学科互动中焕发新活力,实现新发展。

学科交叉与新文科建设:背景、进路与目标

任剑涛

中国的文科学术研究处于一个亟需突破的瓶颈,这是新文科建设提上日程的直接原因。在文科的学科交叉研究与新文科建设的关联审视中,为文科寻求新的发展进路,以期实现突破现状的新文科发展目标,便成为新文科建设的基本任务。

文科学科交叉研究与新文科建设的相关性毋庸多言。新文科建设就是要突破目前文科的客观处境与主观选择,让文科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不至于显著落在时代变迁步伐的后面。为此,首先需要理解两者联结而出的背景。在大小两个背景的审视中,小的背景是文科现状堪忧。从身处文科主阵地的大学来讲,主要表现为分科学术体系中大理科(即理工农医)相较于大文科所表现出来的优势,社会对文科的接受度低,文科就业状况相当低迷。从研究的状态上讲,富有新意与创意的文科研究成果不多,大多处于程度不同的重复水平上,成为人们广为诟病的“圈子学术”。因此,文科与科技革命时代大理科的蓬勃发展形成落差。大的背景则是文科从社会功用上心引引导都相当疲弱。从社会引导力来看,其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大;从国际学术界观察,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的学术成果甚少;从其对社会历史的感受上审视,对接历史文化传统不足不说,对现实的规避也显著可辨,对未来的展望更是缺乏穿透力和启发性。这些弱点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而在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回应上,文科也表现得相当乏力,对历史传统的消费明显强于对现实的准确指点和面对具身智能的勃兴,更是难以做出有力回应。因此,文科学术研究如何寻求突破,成为引发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中追寻老文科“落伍”的主要导因,有两点需共同强调:一是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加剧了文科的危机,急需起直追赶上技术革命的步伐,避免被技术革命大潮抛弃;二是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话语体系建构成为当务之急。将两大方面综合起来看,新文科依循学科交叉(如文文交叉、文理交叉、文工交叉、文医交叉等)新兴进路展开新式研究,具有充分必要性及绝对重要性。新文科建设是因应文科现状做出的一个政策性布局。从促进学科交叉的文科研究政策史角度讲,这是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为政策制定者所强调的方向性原则。到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这一强调的力度显著加强。需要看到,在得到强有力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必须按照文科学术的自身逻辑展开深入探讨,保证学科交叉研究的严谨性与实效性,才能避免政策的悬空,实现新文科建设的有效运行。在新文科建设中寻求学科交叉以实现文科突破的目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就促使人们深入细致地理解学科交叉的意蕴,具体而微地探寻交叉研究的进路,有针对性地确立学科交叉研究的目标。

学科交叉的进路选择,直接影响甚至根本制约了这一研究模式的学术收获和认同结果。就大文科而言,学科交叉研究存在大中小三种进路。大交叉,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国家在大理科与大文科之间长期倡导的进路。这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与社会变迁朝纵深展开所促成的国家科学研究取向。这一取向很难由大学内部力量驱动,必然以国家力量的全方位布局为前提条件。大科学、大技术、大人文的交叉研究攻关,是决定一个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世界地位的研究模式。其研究的实际部署,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甚至是在国际社会确立课题、聚集资源、广泛合作、长期推进、寻求突破。其研究成果殊难取得,一旦获得就会极大地推动科学进步。目前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国际合作属于此类。中交叉,存在国际合作成分,但主要限于一国范围内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可以在三类文化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进行,也可以在某两个学科领域中展开,还可以在一个学科内进行。前者如中国新文科发展的文理综合国家战略安排,中者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渗透,后者则如人文科学的数字化改进。小交叉,主要是在学术界同行中展开的研究工作,其规模不大,课题确定、目标具体、取向明确。诸如哲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社会统计学、情感心理学等交叉研究便是如此。

在此基础上,需要区分交叉研究的两种动力机制。由于文科的研究载体一般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因此,研究机构的学科安排与人员配置,对学科交叉研究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中间存在组织机构交叉与学者个体交叉两种研究路径。前者属于学科导向的交叉研究路径,后者属于问题导向的交叉研究定

位。文科大学与研究机构建立在组织相对固定的建制结构上,因此,学科的组织结构是稳定的。学科的建制,由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积累、学人团体、知识评价、社会认可、影响领域等因素构成。它的相对稳定,是一个学术结构被同行承认与社会接受的标志。正是因为这种稳定性,文科的交叉研究不可能随时随地改变依照学科设立的机构,只能在既定机构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灵活调整。诸如STS(科学、技术与社会)、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这样的跨学科建制与研究委员会(如哈佛大学的宗教研究委员会、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便成为保有既定学科建制的基础上,为相对僵化的学科建制注入灵活性的一种有效安排。

学者个体的交叉研究,属于很难统一规划的分散化研究方式。对于那些罕见的、足以引领一个学科发展的天才型学者来讲,他们身上自然而然地显现出跨学科的天分。如奠定传统学术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孔子与老子,确立现代学术方向的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发展现代学术的马克思、韦伯、罗素、罗斯等等,都是交叉研究的典范。但倡导学科交叉研究,对于那些恪守学科边界的拘谨学人具有特殊意义。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定势,进入某个学术组织的人员,习惯性地信守学科与学科组织的边界,常常不敢越雷池半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学术生涯平平顺顺。陈规陋习造就了谨小慎微,文科的知识突破非常少见。相对于大理科学者而言,文科学者最擅长的应当是对社会变化的敏锐感知、思想诊断与学术表述。相关的学术研究实践,在恪守既定学科与学术边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创获的。因此,需要大力倡导学科交叉,以求创造性回应大变动时代的根本挑战。身处大变动时代的文科学者,需要勇敢跨出学科的舒适区,在不同学科间游走,以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联动催生的大问题进行有力的思想-学术回应。

与现代学术总体上的特点一致,现代文科学术发展呈现出精细化与宏大化的特点。这意味着文科学科交叉研究不会单纯指向宏大论题,需要多学科攻克微观难题会同时呈现在文科学术领域中。在前者,学科交叉呈现为多学科、宏大化的合作;在后者,学科交叉主要表现为跨学科、具体化的问题探究。前者需要突破大学与研究院的学科建制壁垒,不受学科学术的限制;后者则需要谨守学科建制,在现有的学科设置基础上寻求合作。前者显现出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院之间、产学研之间、国际层次与国家范围的研究动员;后者则展现出大学与研究院内部因应具体问题研究所需要的院系整合。为推动文科学科交叉研究,需要从基础性训练到高深研究进行系统规划:从培养学科交叉研究的后备队伍上讲,不仅要弥补现代专业知

识灌输造成的人文缺失,也要消除专业壁垒造成的知识遗漏。从激励从事高深研究的博士生与专家的角度讲,跨学科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有助于形成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视野、新论题和新成果。

归根结底,文科学术研究的学科交叉尝试,依赖于从业者即文科学者积极响应。从学术源流上讲,文科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知识源头在于,学科的最初定位便是交叉性的。当下倡导的学科交叉,其实可以称为学术返祖现象。现代学术分科日益细密,但不存在自然孤立的单一科学学术问题以及相关研究范式。新文科建设需要因应这一学术大趋势,积极鼓励文科学者顺应学术大潮,并做出相应的大学与研究院体制机制调整。这是新文科的创新之路。

文科学科交叉研究与新文科的建设,直接基于两种反应方式及相应矫正机制:危机性反应和跟随性补缺,战略化决断与引导性定位。文科现状激发的危机感,尤其是应对科学、技术大革命造成的文科发展相对迟滞,是目前倡导新文科、展开交叉研究的直接动力。文科尝试自我革命,以期跟自然科学的发展齐头并进。但学科交叉基点上的新文科建设,不应受困于这一被动的反应机制。变被动为主动,是新文科建设中学科交叉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涉及文科交叉研究以及新文科建设的大战略选择问题,站在主动引领科技发展的位置上,不应为文科危机或人文危机所挫败,而应为文科转机或人文重建所激励;站在被动适应的位置上,则会为文科落伍或人文失落所困,让文科陷入难以化解的困顿状态。何去何从,不言而喻。

在新文科建设中着力进行的交叉研究,具有宏观与微观的不同目标模式:从前者讲,基本目标是重塑价值、整饬人心,改善功用、利好社会,优化政策、寻求善治。就后者论,主要目标是改善大学文科现状,扶正文理严重倾斜的天平,发挥文科引领社会前行的作用。在两者之间的中间性目标,则是有力促进人文学术的长足进步,促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种文化均衡发展,有力保障人类社会对于自身、社会与环境的健全认知与实践谋划。这些目标属于预期值,是否能够成功实现,有赖于文科学者及有关各方竭心尽力的奔赴。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在当前知识创新与教育转型的背景下,文科如何转型与创新,已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长期以来,依托严格学科分野而建立的教学与研究方式,越来越难以应对复杂的现实挑战,无法满足新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文科建设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推动文科突破固有的学科壁垒,通过与理工农医等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并非简单地把不同学科的知识拼接在一起,而是要从根本上重构知识生产方式、革新人才培养体系,并提升文科服务社会的能力。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方式

传统文科的知识体系建立在相对清晰的学科分工基础上,形成了文史哲、政法经等界限清晰的学科版图,其知识生产主要依赖文献阐释、理论推演和历史比较等方法,优势在于思想的深度与批判的锐度。然而,当面对诸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跨学科议题时,这种模式往往暴露出解释力不足的短板。交叉融合为文科打开了新的突破口,将重心从学科本位转向问题导向,提升知识生产的协同性与创新性。

交叉融合孕育了新的研究方向,推动文科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当文科擅长的历史洞察与社会分析能力,与自然科学强调的工具理性、实证方法相结合时,往往能形成应对复杂问题的新思路。这类研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既有框架,而是在分析具体问题时灵活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政治学与信息科学交叉形成的计算政治学为例,它不仅关注传统政治理论在数字环境中的应用,还借助计算模型和大数据分析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的运行机制。新兴交叉学科的出现显示出文科研究正在从内部深化向外部拓展转变,凸显出文科在当下自我革新、参与公共议题的广阔前景。

文科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中的新突破与新发展

高景柱

交叉与融合通过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提升文科研究的科学性与前瞻性。随着跨学科合作的深入,文科研究开始借鉴自然科学中的量化分析、实验设计等方法,推动研究路径的多样化。除了传统文献,各种新型数据也成为文科研究的素材,从而让研究结论建立在更广泛、可验证的证据基础上。人文社科实验室的出现为这一方法转向提供了依托,它们不再是理工科的专属,而是逐渐成为文科研究者进行行为分析、实证研究的平台。

交叉融合也进一步增强了文科研究的本土意识和自主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新文科建设倡导立足中国实际,通过学科间的协同,力图全面、深刻阐释中国的治理实践和现代化发展路径。比如国家安全学融合了政治学、法学、情报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理论依据,逐步建立起与国家治理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这类以本土需求为导向的交叉研究,有助于减少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构建彰显中国立场和原创性的知识体系。

二、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的重塑

新文科改革将育人作为中心任务,通过推动不同学科的交融与互动,促进人才培养体系的整

体升级。在课程设置上,高校目前正在主动打破专业壁垒,构建更为灵活、开放的跨学科课程体系。比如借由模块化的课程设计,让学生在夯实本专业基础的同时,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诸如数据伦理、数字媒体、公共政策分析等跨学科课程,就能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层次化拓展。一些高校还推出了数字人文等微专业,鼓励学生在主修专业之外,自主选择跨学科课程,形成个性化的知识结构。这样的安排打破了传统专业间的界限,让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相互碰撞,激发新的学习活力。

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关键是要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培养出复合型的创新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打破院系界限,组建来自不同领域的教学团队。传统的单一导师制也需要调整,更适合的模式是由不同学科教师组成导师组,构建交叉、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推进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也至关重要。文科教育要把产业界的真实问题、前沿技术和实践资源引入教学的全过程,比如共建校外实践基地、校企联合制定培养方案等。

在新文科的课堂上,教学方法正在发生改变,其核心是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研究带动学习。像项目式学习、案例研讨、翻转课堂等探究式教学方法被广泛采用,鼓励学生围绕现实问

题,自发组建跨专业团队,开展联合研究。为了支持这种主动的学习模式,各高校也在积极打造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实践基地等。部分高校实施的研究型教学有意将学生置于真实的情境中,让他们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此类教学改革的深层意图在于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应对复杂问题的综合素养。

新文科教育正在推动评价方式的多元化,项目设计的创新性、社会实践的实际效应、跨界合作的表现,乃至创新成果的转化情况,正逐步被纳入考核范围。目前,不少学科已不再将单一的学术论文作为核心的毕业标准,学生可以选择完成一份能够聚焦社会需求的综合性报告,甚至设计出产品的雏形。因此,设计一套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显得尤为重要,这样的体系应当包括项目成果、实践报告等多样化的形式,以此引导学生提升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

三、服务国家战略:从理论阐释到实践引领

文科在交叉与融合中实现的发展,核心价值在于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社会进步。传统文科的社会服务功能更多体现为政策解读、文化传播和理论支撑等形式,往往具有滞后性。通过交叉融合,文科正将其服务社会的方式,从阐释者和评论者更多地向前沿的参与者和建构者转变。

交叉融合使文科能够更有效地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无论是创新驱动、数字经济,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所应对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还需要关注价值抉择与制度安排等议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促使我们既要关注数字治理、智慧城市等议题,更要审视在技术应用中如何维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同样,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政治学与语言学、历史学等的交叉,也加深了我们对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的理解。

交叉融合正在重塑文科在社会精神秩序构建中的位置,使其在文化领导权与公共理性塑造层面获得更为实质的能动性。当文科与信息科学、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深度融合,文化传承与思想传播就能够以更加生动、更具互动性的形式展开。近年来,通过数字媒体等交叉学科培养的人才,已经推动了一批展现中国文化底蕴作品的诞生。与此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社会舆情与公众情绪,也为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生态、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科学依据。

交叉融合正在重塑文化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传统文科的文化传播模式呈现出单向的特征,而现代技术手段的引入,使文化传播转向互动性与体验性并重的局面。比如不少数字人文项目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让历史文化变得更加生动,观众不再只是被动地听和看,而是成为文化叙事的参与者和共情者。在价值观念的引导方面,交叉融合也显示出独特的优势。比如跨文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与传播技术的融合,有助于准确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接受心理与习惯,进一步打破文化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使文明对话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成为可能。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B251006502)阶段性成果】